

论“五色四藩”的来源及其内涵

乌云毕力格 孔令伟

根据对蒙古文和藏文史料分析考察可以得知：“五色四藩”概念出现在十六世纪后半叶，它的出现与藏传佛教第二次传入蒙古有关。五色来源于五方佛的颜色，四藩则指主供佛周围的四佛。青色蒙古的说法起源于蒙古对密宗金刚乘无上瑜伽部的信仰。“五色四藩”概念在蒙古的流行反映了蒙藏文化的交流和交融。

关键词：五色四藩 曼陀罗 青色蒙古 蒙古文献 民族文化交流

作者乌云毕力格，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地址：北京市，邮编 100082。孔令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博士研究生。地址：美国纽约市，邮编 10027。

迄今为止发现的蒙古文文献中，最早在《十善法白史》^①（以下简称《白史》）中第一次提到了一个历史术语——tabun öngge dörben qari。该术语在此后的蒙古文献中屡见不鲜。在汉文著述中，它一般被译为“五色四夷”（笔者译为“五色四藩”，理由见下文），被认为意指蒙元帝国统治的全体民众。

蒙古学界很早就有人注意到这一术语并探讨了其所指。但是，所谓的“五色四藩”来源如何？为什么是“五色”和“四藩”？它指什么？有何文化内涵？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圆满解决。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了解蒙藏民族文化和交流，也有助于推进蒙古文化史一些领域的研究，本文拟就此展开讨论，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白史》中的两种“五色四藩”

《白史》一书中提到，忽必烈建立政教四大政治后，“遂向五色四藩大国颁布圣旨曰……”“在五色四藩大国里，十户长、五十户长、百户长、千户长、万户长、万万户长等，各管辖其兀鲁思与爱玛”。^②接着，《白史》正文中提到，忽必烈薛禅皇帝向“居中之所有众生之尊大蒙古（yeke mongyol），东方之莎郎合思（solongyos）与必贴衮（bitegün），南方之汉儿（kitad）与奇列惕

^① 关于《十善法白史》一书，请参考乌云毕力格：《十六世纪蒙古“浑臣”考》，《内蒙古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王政者，文武二治也——释〈白史〉中的 ANKKA 与 KILBAR（ČINK、IIQ-A）》，《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六辑，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② Arban buyan-tu nom-un čaya tegüge neretü sudur-un ekin orosiba, ene šasdir kememü,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本，收藏号：1100325.22.912\25:7，叶3上。

(keliyed), 西方之巴勒布(balbu)与撒儿塔兀勒(sartaγul), 北方之大食(dasig)与吐蕃(tübed), 向此五色四藩九大国(tabun öngge dörben qari yisün yeke ulus)威严宣布”。^① 但是,在《白史》结尾部分,也即跋文里又如如是讲:“长生天的气力里,大福荫的庇护里,成吉思汗的恩泽里,五色四藩大国,即东方之白色莎郎合思、速而不思(surbus),南方黄色撒儿塔兀勒、兀儿土惕(urtoyud),西方红色汉儿与南家子(nanggiyad),北方黑色吐蕃与唐兀惕(tangγud),东北必贴衮(bitegün),东南巴勒布,西南奇列惕,西北大食,中央之四十万青色蒙古与瓦剌(töčin tümen köke mongγol oyirad kiged)……”^②

这是《白史》对“五色四藩”的前后不一致的两种解释。依第一种说法,以大蒙古为中心,以四面的八大民族为藩属,总称“五色四藩九大国”。再据第二种解释,以青色的蒙古和瓦剌为中心,四面环绕白、黄、红、黑四色的八大民族,再加上四个偏方的不分颜色的四个民族共称“五色四藩”。

为什么同一部书里的“五色四藩”如此不一致呢?在第一种说法中,只有中心和周边之别,不以颜色区分各族,^③而各族数的总合为“九大国”,可称之为“一个中心四边八族格局”;在第二种说法中,则中心与周边分成五个不同的颜色,民族数从“九大国”变成了“十三国”,以“五色四藩”概括。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哪一种说法里,所提到的周边民族的位置与他们同蒙古的实际地理方位关系有偏差,甚至严重不符。据此,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首先,最初蒙古并无“五色四藩”的抽象概念,各民族只有中心和周边之分;其次,起初,中心与周边并不以颜色区分,五色区分法是后人所作,这个现象又反证《白史》是一部较晚成书的编排不同历史时期蒙古佛教文献的集子;再次,《白史》的“五色四藩”是一个抽象概念,指代多民族,因此被提及的具体民族、具体方位和具体数字都与现实不符。概言之,“五色四藩”的概念是《白史》作者在某种特殊文化现象的影响下,将原有的中心与周边之说替换成了“五色四藩”。

《白史》中的第一个“五色四藩”,可以总结为“一个中心四边八族格局”,而第二个“五色四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五色四藩”概念。查阅藏文资料发现,蒙古人的“一个中心四边八族格局”其实来自西藏。这种叙述模式在西藏大概萌芽于《红史》中,在《汉藏史集》中趋于完善,而其思想根源则是佛教的“器世间”(物质世界)观念。^④

佛教经典《阿毗达磨俱舍论》讲,宇宙的中心为须弥山,而须弥山周围有四大洲,四大洲的两边各有二中洲。这样的宇宙观直接影响了古代西藏人对自己和周边世界的认识,进而在他们的史学中得到了反映。在藏文史书中,记载松赞干布时期吐蕃繁荣景象时,往往以吐蕃为中心,提及其周边各族(国)。比如,藏文典籍《红史》(1363年成书)记载,松赞干布弘扬佛法,委派吞米桑布扎创造文字,为吐蕃臣民制定“十善法”(dge ba bcu'i khirms),并划分行政区,“将

① Arban buyan-tu nom-un čaya tegüge neretü sudur-un ekin orosiba, ene šasdir kememü, 叶7下。

② Arban buyan-tu nom-un čaya tegüge neretü sudur-un ekin orosiba, ene šasdir kememü, 叶13上。

③ 此处也概括称“五色四藩九大国”,提及五色,但具体内容里并未分五色,可以看出“五色”一词显然是作者用后面的概念追述的。

④ 蒙古人了解和接受佛教器世间说教是在元代。八思巴喇嘛著《彰所知论》,阐述佛教所说的以须弥山为中心的器世间构成,专为元朝皇家子弟讲授。但是,从迄今为止发现的资料来看,该学说并没有影响蒙古人对世界各民族分布的认识。蒙元时期的蒙古人“认为太阳依次照到的地方即为整个世界”。“具体反映为一种概念性的说法,即从东方日出之地至西方日落之地为止的区域”(乌兰:《蒙古文历史文献中涉及“国”及其相关概念的一些表述方法》,《民族研究》2016年第2期),即一种世界的线性分布,而不是环形分布。蒙古人的以自己为中心、各民族环绕其周围的世界分布构想不是在《彰所知论》的启迪下直接形成,而是间接从西藏传入的。

南面的珞与门(blo dang mon)、西面的象雄(zhang zhung)、北面的突厥(hor)、东面草地居民(rtsa mi)和森林居民(shing mi)收归之下”。^① 这里虽然没有完美地勾勒出“一个中心四边八族格局”,但已经有其雏形。其后,《汉藏史集》(1434 年成书)记载瞻部洲中心和边缘时写道:“东部有汉地(rgya nag)、契丹(khri brtan),南部有印度(rgya gar)、克什米尔(kha che),西部有大第(stag sde)、食彭(gzig 'phan),北部有冲木(khrom)、格萨尔(ge sar),中心为雪山环绕之吐蕃,共九个部分。”^②再到后来,《贤者喜宴》(1564 年成书)记载:松赞干布时期,“自东方汉地(rgya)及木雅(mi nyag)获得工艺及历算之书。自南方天竺(dkar po'i rgya gar)翻译了诸种佛经。自西方之胡部(sog po)、泥婆罗(bal po),打开了享有食物财宝的库藏。自北方霍尔(hor)、回纥(yu gur)取得了法律及事业之楷模”。此时,“东方之咱米(rtsa mi)、兴米(shing mi),^③南方之珞(klo)与门(mon),西方之象雄(zhang zhung)及突厥(gru gu),北方之霍尔(hor)及回纥(yu gur)等均被收为属民”。^④

如果我们注意考察《白史》所载蒙古周围的八大民族,就会发现,其中的“必贴衮”、“奇列惕”、“大食”等民族在蒙元时期或并不知名,或未曾与蒙古接触过。德国学者萨迦斯特将“必贴衮”比之为蒙古乃蛮部或汉语的“北狄”,而将“奇列惕”视为克列亦惕部,^⑤但没有文献根据。另外,被提及的“大食”,在汉语里指唐宋时期的阿拉伯人国家及伊朗语地区穆斯林。在藏文文献中经常提到大食(Ta zig, Stag gzig),指的是吐蕃时期的阿拉伯人。蒙古帝国虽西征阿拉伯、波斯地区,但当时那里的穆斯林不再被称为大食,因此蒙元时期的蒙古人一般用“撒儿塔兀勒”(sartahul)称呼这里的穆斯林,^⑥而未曾用过 dašhig(大食)之称。如此看来,《白史》所讲的蒙古周边民族,只是模仿藏文史籍记载,在中心周围每一方配齐两个民族,以此凑“九大国”之数。

我们注意到,《白史》作者将蒙古及其周围的诸民族称为“五色四藩”,但并不标注颜色,只在跋文里将各民族的颜色加以指明。从中不难看出,蒙古史家首先从藏文史籍里引入了“一个中心四边八族格局”的记载模式,而后又根据作者生活时代的佛教文化中的特殊现象将其加以发展,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五色四藩”。其中所谓特殊现象,就是十六世纪在蒙古传播的密宗曼陀罗文化,对这个问题下文将做详细论证。

① Tshal pa si tu kun dga' rdo rje, *Deb ther dmar po*, Pe cin 1981, Mi rigs dpe skrung khang, pp. 35-36。译文见蔡巴·贡噶多吉著,东嘎·洛桑赤列校注,陈庆英、周润年译:《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2 页。

② Stag tshang po dpal 'byor bzang po, *Rgya bod yig tshang chen mo*, Khreng tu'u, Si khron mi rigs dpe skrun khang, 1985, p. 10。译文见达仓宗巴·班觉桑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原名《贤者喜宴瞻部洲明鉴》),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1 页。

③ 即陈庆英前引文所译“草地居民和森林居民”。

④ Gtsug lag 'phreng ba, *Chos 'byung mkhas pa'i dga' ston*, Pe cin, Mi rigs dpe skrun khang, 1986, pp. 184, 194。译文见巴卧·祖拉陈瓦著,黄颢、周润年译注:《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0、53 页。

⑤ 参见 Klaus Sagaster, *Die weisse Geschichte: Eine mongolische Quelle zur Lehre von den beiden Ordnungen Religion und Staat in Tibet und der Mongolei*,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76, pp. 305-307。

⑥ 现存最早畏吾体蒙古文碑文“移相哥石碑”中称,成吉思汗远征“sartahul irgen(萨儿塔兀勒百姓)”(道布整理、转写、注释:《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民族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 页影印件),指的是远征花剌子模。但 Sartahul 不是花剌子模的蒙古语专名,而是泛指穆斯林。《元朝秘史》对 sartahul 的旁译为“回回”(四部丛刊三编本,第 11 节)。还有,元代西宁王忻都碑中有 sartaqcin ayan 一词,仍指成吉思汗对穆斯林地区的西征(参见道布整理、转写、注释:《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第 348 页影印件第 6 行)。

二、十七世纪以降蒙古文献对“五色四藩”的解说

到清代,蒙古史家们对“五色国”、“五色四藩”等概念已不很了解,于是按各自的理解,根据各自的历史知识,诠释“五色四藩”,因此产生的说法可谓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这里就几部重要文献的说法进行简单介绍。

佚名《俺答汗传》(1611年)、佚名《黄金史》(十七世纪初)、萨冈彻辰《蒙古源流》(1662年)、善巴《阿萨喇克其史》(1679年)等蒙古文史书只提到“五色国”这个术语,但未做进一步解释。

对“五色四藩”的诠释,似始于佚名《大黄史》(十七世纪中叶)。该书记载:“吐蕃金座王有十个儿子,其年长五子未给其年幼五弟分家产,故其年幼五子出走,成为五色国。孛儿帖赤那成为青色蒙古氏,另一子成为白色莎郎合惕(氏),另一子成为黄色撒儿塔兀勒(氏),另一子成为红色汉儿(氏),另一子则成为黑色唐兀惕(氏)。所谓四藩,即此五(氏)之四为另一(氏)之藩。”^①

罗藏丹津《黄金史》(十八世纪初)载:“在蒙古,福荫具足的圣成吉思汗征服五色大国。南方汉儿之阿骨打金(朝)汗,西方吐蕃之失都儿忽汗,北方撒儿塔兀勒之速勒坦汗与篾力,东方莎郎合惕之不合察罕汗,是为四方之四藩。”^②

衮布扎布《恒河之流》(1725年)载:“所谓五色五(四之误——本文作者)夷^③者,有史书中称,青色蒙古、红色汉儿、黑色吐蕃、黄色撒儿塔兀勒、白色莎郎合惕云云。此为五色。因语出蒙古,故其余四(色)为(蒙古之)外夷。亦有书云五色如前,而四夷者谓独脚人樺地国、女儿国、胸目人国、狗头国也。此等虽为书中所载,但彼等百姓皆为归化圣人文化之官人,何故如此以色区分、以夷称之,仍不明白。”^④

答哩麻固什《金轮千辐》(1739年)记载:“圣成吉思汗承天奉运占据瞻部洲东方十二汗之国,建立九行省、五色四夷:中央为七十二爱玛四十余万蒙古中央大省;东方诸爱玛百姓为白色莎郎合思、奇鲁科惕二行省;南方诸爱玛兀鲁思为红色汉儿、必贴古惕二行省;西方诸爱玛兀鲁思为黑色唐兀惕、大食二行省;北方诸爱玛兀鲁思为黄色撒儿塔兀勒、土客木黑(即托克马克——本文作者)二行省,合而九行省。五色即此五色。……四夷者,有人云,外行省之四色兀鲁思须向中央兀鲁思纳贡,接受其文教、谕旨、律令,外来而内奉文法,故称之为外夷;有人云,(成吉思汗)赐予四弟及四子以忽必(家产——本文作者),下旨令彼等自理其国,故称之为内四藩;亦有人云,独脚国、女儿国、胸目人国或无头人国、狗头国或人妇狗夫国,抑或骑兔子大小马之胳膊大小人国,彼等为异类人种,非亲情之国,故称之为外夷,云云。”^⑤

喇什朋楚克《水晶念珠》(1775年)载:“圣成吉思汗之五色者,中央大国为青色,东方为白

① Sampildondovyn Chuluun, Shaddarsurengiin Tserendoo sudalsan, *Erten-ü mongyol-un qad-un ündüsün-ü yeke sir-a tuyuji*, Ulaanbaatar, 2012, pp. 133-134, Text: 31b, 32a.

② Lubsandanjin zohioson, Sharvyn Choimaa sudalsan, *Erten-ü qaad-un ündüsülügen törü yoson-u jokiyal-i tobčilan quriyaysan altan tobči kemegdekü orusibai*, Ulaanbaatar, 2011, pp. 712-713, Text: 130ab.

③ 衮布扎布理解该词为“夷”。

④ Gumbūjab jokiyaju, Choyiji qaričayulun tayilaburilaşan, *Gangγ-a-yin urusqal*, öbür mongyol-un arad-un keblel-ün qoriy-a, 1980, pp. 167-168.

⑤ Dharma jukiyaju, Choyiji tayilaburilaşan, *Altan kürdün mingyan kegesütü*, öbür mongyol-un arad-un keblel-ün qoriy-a, 1987, p. 306.

色,南方为红色,西方为黑色,北方为黄色,此五部之纛旗颜色皆随各自之色。四夷者,东方之白色莎郎合思国,南方之红色汉儿国,西方之黑色唐兀惕国,北方之撒儿塔兀勒国。亦有作(成吉思汗)四弟之封国为内四藩者。”^①

噶勒丹在《宝贝念珠》(1841年)中记载:“五色为青色蒙古,红色汉儿,黑色吐蕃,黄色撒儿塔兀勒,白色莎郎合思。四夷为水夫女儿、东省、胸目、狗头四者。”^②

津巴多尔济《水晶鉴》(1849年)载:“从成吉思汗到这位薛禅皇帝所征服的国家有:青色蒙古四百万余户、红色汉儿、黑色吐蕃、黄色萨儿塔兀勒、白色莎郎合思等五色国和狗头、胸目、乌萨、准噶尔卒客迪等四夷,以及道貌、服饰各异的人类七十二种。”^③

可见,十八世纪以降,蒙古人对“五色四藩”这个术语越来越生疏了,但他们都试图做阐释。对“五色”的解释各家虽有一定分歧,但基本遵循了《白史》的说法,即以青色蒙古为中心,四周分布白色莎郎合思(即高丽)、红色汉儿、黄色撒儿塔兀勒(即回回)和黑色吐蕃。但是各家对“四藩”的解释比较不一致,将蒙古语的 *qari* 一词或理解为“藩属”,或理解为“外夷”,由此产生了三种说法:一是周边四色为中央青色之藩或夷之说;二是成吉思汗四子与四弟之兀鲁思为四藩之说;三为形态各异的独脚人国等外夷说。关于第三种说法,乔吉认为,这是清代蒙古文人利用元代周致中所著《异域志》等汉文文献中的各种离奇古怪的远方人类记载的结果。^④ 鉴于以上史书大部分出自僧人之手的事实,第三种说法的最初史料来源更有可能是《汉藏史集》。^⑤

三、蒙古史家与中外学者对“五色四藩”术语起源的解释

根据以上介绍,所谓的“五色四藩”泛指蒙古统治下的诸民族和人民,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蒙古人为什么造出这样一个新术语来指代他们呢?它的来历和文化意趣又是什么呢?它说明了什么问题?

清代蒙古文人史家曾试图对此术语的渊源做出合理的解释,形成了几种不同的说法:

衮布扎布在《恒河之流》一书中首先解释“五色四藩”,根据成吉思汗问道于长春真人和窝阔台可罕与薛禅皇帝以降蒙古统治者奉行汉法之史实,认为“五色似指以宫商角徵羽五行涵盖五个种姓的中部诸国家与百姓,而四夷则位于中国四周、纳贡受封的诸外国之总称,汉语现有之‘四夷’之蒙古语译语”。^⑥ 衮布扎布是将 *dörben qari* 译成“四夷”的始作俑者。

答哩麻固什在他的《金轮千辐》中解释五色时写道:“物质存在之道在于五行,故概括于空、风、火、水、土之本质而命名者。”对于“四夷”,则引述了历史上不同的说法,未提出己见。^⑦

① Rasipungsuy jokiyaju, *Kökeündür*, tayilaburilaysan, Bolor Erike, öbür mongyol-un arad-un keblel-ün qoriy-a, 1985, p. 137.

② Galdan Tusalayci, *Erdeni-yin erike kemekü teüke bulai*, Transcription by J. Gerelbadrakh, Edited by Yo. Janchiv, Ulaanbaatar 2007, pp. 65b, 66a.

③ Jimbadorji jokiyaju, Liu Jinsuo tayilaburilaysan, *Bolor Toli*, öbür mongyol-un arad-un keblel-ün qoriy-a, 1987, pp. 439-440.

④ 参见 Dharma jukiyaju, Choyiji tayilaburilaysan, *Altan kürdün mingyan kegesütü*, p. 86.

⑤ 《汉藏史集》述及瞻部洲大小十三国时,指出印度、汉地、大食、冲木格萨尔和吐蕃外,还记载了“非人”统治下的八国:廓克拉粘胸之国、铁让独眼之国、杰琶种姓卑贱之国、索波猿臂之国、嘉莫狗夫之国、大耳朵驴国、策策山羊头之国、祖达独脚之国,参见 Stag tshang po dpal 'byor bzang po, *Rgya bod yig tshang chen mo*, p. 11; 译文见达仓宗巴·班觉桑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第12页。

⑥ Gumbüjab jokiyaju, Choyiji qariçayulun tayilaburilaysan, *Gangy-a-yin urusqal*, pp. 169-170.

⑦ 参见 Dharma jukiyaju, Choyiji tayilaburilaysan, *Altan kürdün mingyan kegesütü*, pp. 306-307.

乌拉特蒙古莫尔根庙(今包头市梅力更庙)葛根(活佛)罗布藏丹毕坚赞在其《黄金史》(十八世纪中叶)中对“五色四藩”做了如下注释:“五性者,仁义礼智信,称之为‘五色四夷(作者仍把 qari 一词理解为外夷——本文作者)’。大而言之,为宇宙之成规。小而言之,个体之属性。就朝政而言,是文韬武略之学,对教法而言,经与陀罗尼(即显宗与密宗——本文作者)之学。为何称之为‘五色四夷’?仁者,柔性,木行;义者,刚性,金行;礼者,热性,火行;智者,寒性,水行。刚柔相对,寒热相对,仁义相称,礼智相称,形成阴阳,故为‘四夷’。信者,土性,普遍无分别,非夷,无夷,非众,非一。与之(即‘四夷’——本文作者)相合,故为‘五色’。禁杀生者,谓仁。不予不取,谓义。不邪淫,谓礼。忌醉酒,谓智。不妄语,谓信。仁者,平等性智。义者,成所作智。礼者,大圆镜智。智者,妙观察智。信者,法界体性智。此等亦可谓经与陀罗尼之学。”^①

噶勒丹在《宝贝念珠》中解释蒙古为什么是青色蒙古时写道:“称青色者,因为成吉思汗为青色金刚持之化身,故有青色蒙古之名。”^②

前两种意见,或着眼于中原的“五音”和“五行”,或根据中原政治文化中的“中华”与“四夷”之别,虽然勉强与“五色四夷”的“五”和“四”两个数字相对应,但缺乏根据,过于牵强,不能令人信服。但是,莫尔根活佛的见解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他把儒家的“五常”和“五行”及佛教的“五恶”、“五毒”和“五智”联系起来解释“五色”,并根据“五行说”中土为中性而且居中的说法,解释“四夷”为土行以外的四行,因此,在莫尔根活佛看来,“五色四夷”实际上就是“五行”,也是“五智”。他还认为,这在政治上体现了刚柔结合的文武二道,而在教法方面则体现了咒(陀罗尼)与经相结合的显密二宗。而噶勒丹虽然仅仅对蒙古以青色自居的原因做出解释,而不涉及其他四色,但此说仍具有重要意义。结合笔者对此问题的观察研究,莫尔根活佛和噶勒丹见解的一些方面可以说一针见血,有助于更加清晰地认识“五色四藩”的来源和内涵。

那么,当代学者们是怎么理解“五色四藩”的呢?

1957年,苏联学者沙斯季娜在注释《大黄史》时讲到,蒙古人的五色可能和他们所掌握的亚洲各民族实际生活的民俗学知识相关。比如,称高丽为白色,是因为高丽人穿白色衣服;称吐蕃为黑色,是因为他们住在黑色帐篷里;萨尔塔兀勒(回回)成为黄色,可能是因为他们住在黄色的土房子里;蒙古青色是因为他们全民信仰萨满教,奉长生天为最高神的缘故;汉人为什么是红色,不得而知。至于想象中的四夷,则是来自中亚、波斯和北亚的故事和传说。总之,这是关于构成中世纪蒙古帝国各民族的民俗学简称。^③可见,沙斯季娜止于对“五色四藩”的表面理解和牵强解释。

1976年,萨噶斯特在《白史》中提出了另外两个可能性。他认为,《白史》提到的“五色四藩”形成了一个圆圈,即一个政治坛城,和佛教的宗教坛城一样,中心和四个主要部分各有一个颜色。他认为,佛教的坛城以须弥山为中心,周围四方有四色四洲,而《白史》的政治坛城与此一样,以蒙古为中心,形成了五色民族。^④接着,萨噶斯特还根据蒙古的“九大国”、“五色”和“十二恶汗”一类的记载,认为“五色四藩”的概念也不能排除另有来源,那就是汉地的影响。萨

① Lobsangdambijalsan, *Altan tobči*, öbür mongγol-un suyul-un keblel-ün qoriy-a, 1998, pp. 91-92.

② Galdan Tusalaγei, *Erdeni-yin erike kemekü teüke bulai*, Transcription by J. Gerelbadrakh, Edited by Yo. Janchiv, p. 58a.

③ 参见 N. P. Shastina, *Shara Tudji — Mongoliskaya Letopisy XVII Beka*, Moskva Leningarad, 1957, pp. 78-79.

④ 参见 Klaus Sagaster, *Die weisse Geschichte: Eine mongolische Quelle zur Lehre von den beiden Ordnungen Religion und Staat in Tibet und der Mongolei*, pp. 311-312.

噶斯特为此举了中国古代帝王尧将其国分为十二部分,其继承者舜将其国分为九州,以及内地的五方五色说等例子。必须指出,萨噶斯特把“五色四藩”和佛教的坛城联系起来考虑,完全是一个新思路。但需要注意的是,佛教的“器世间”理论即宇宙形成说和密宗的坛城理论虽然有内在联系,但毕竟不是一回事,二者不能混淆。

此外,在解释蒙古为什么是青色时,萨噶斯特受到噶勒丹《宝贝念珠》的启发,认为,这与成吉思汗为金刚持菩萨化身说可能有关。^①如后文将论述,这是可信的。遗憾的是,萨噶斯特对此并没有做进一步的论述。

珠荣嘎译注出版蒙古文《俺答汗传》,其中对“五色”的解释如下:“其实,五色国之‘五色’,来自佛教的‘五方色’,即东方黄,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中央青。五色国即东、南、西、北、中,指居中的青蒙古(höhe Monggol)及其周邻地区。五色(tabun öngge)又与四异邦(dörben hari)连用,汉译‘五色四夷’,即五色国的异称。”^②珠荣嘎虽说五色“来自佛教的‘五方色’”,但他列出的色和方位却与佛教五方佛不一致。

贺希格陶克陶在《“五色四夷”考》一文中认为,“五色四夷”就是元朝统治下的蒙、汉、藏、朝(指高丽)和回回等五个大民族(五色)以及其他欧亚众多的弱小民族或部落(四夷),其中的有些部落当时也许尚处在原始社会阶段,所谓的“女儿国”可能指那些还处于母系社制社会的氏族。至于“五色四夷”一词的产生,贺希格陶克陶认为:“它可能是以蒙古人的民族学观念为基础,吸取汉民族‘五方’、‘五色’说的某些观点而形成的、总称元帝国统治下的各民族和地区的代名词。”^③

四、“五色四藩”的由来和文化含义

那么,“五色四藩”的由来和文化含义到底是什么呢?莫尔根活佛用儒家思想和佛教教义结合起来解释“五色四藩”。他指出,“禁杀生者,谓仁。不予不取,谓义。不邪淫,谓礼。忌醉酒,谓智。不妄语,谓信。仁者,平等性智。义者,成所作智。礼者,大圆镜智。智者,妙观察智。信者,法界体性智”。^④从根本上讲,莫尔根活佛是用佛教“五智”来解释五色的,而仁义礼智信则是用儒家学说的概念阐释“五智”的本质。在莫尔根活佛提到的杀生、偷盗、淫邪、妄语、饮酒是指佛教所言“五恶”,而这“五恶”正是佛教所说“五毒”所致。“五毒”即贪、嗔、痴、慢、疑。佛教为了使人类弃恶从善,劝人类要戒五恶,化五毒。在佛教中于是乎出现了化“五毒”为“五智”的“五方佛”。“五智”就是莫尔根活佛提到的平等性智、成所作智、大圆镜智、妙观察智和法界体性智,它们本质上也就是“五方佛”。因此,归根到底,莫尔根活佛注释的落脚点就是在“五方佛”上面。

那么,“五方佛”是什么概念?五方佛与佛教密宗关系密切。密宗,或作密教、密法、密续、续部、密咒、密乘、陀罗尼等等,梵文为 guhya-yāna,藏文为 gsang sngas(秘密真言)或 rgyud(续)。一般认为,佛教密教思想体系形成于公元七世纪的印度,其标志为《大日经》和《金刚顶

^① 参见 Klaus Sagaster, *Die weisse Geschichte: Eine mongolische Quelle zur Lehre von den beiden Ordnungen Religion und Staat in Tibet und der Mongolei*, pp. 315.

^② 珠荣嘎译注:《阿勒坦汗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5 页。

^③ 贺希格陶克陶:《“五色四夷”考》,《贺希格陶克陶文集》(下卷),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0—43 页。

^④ Lobsangdambijalsan, *Altan tobči*, pp. 91-92.

经》的成立。八至九世纪时,密教形成,并在印度南部、东部和德干高原流行,形成了金刚乘、易行乘等分支,十一世纪又出现了时轮乘。金刚乘密教以《金刚顶经》为中心,属于左道密教(而右道密教则以《大日经》为核心),包括四部密续,即事部密续、行部密续、瑜伽部密续和无上瑜伽部密续。从七世纪以后,印度密教直接传入西藏,被称作“藏密”。

藏密以密宗的金刚乘为主流,而“五方佛”(梵文:Pancakula,藏文:Rigs lnga)正是金刚乘教法的核心。《金刚顶经》的中心为“五佛显五智说”。五佛指的是:毗卢遮那佛(大日如来)、阿閼佛(不动佛)、宝生如来、阿弥陀佛,不空成就佛。五佛有各自的方位、颜色、种子符号、动物宝座、明妃和菩萨等眷属、手印和象征物。^①现将金刚乘的五方、五色、五毒、五智与五佛的配置列一简表:

方位	五色	五毒	五智	五佛	五部
中	蓝	嗔	大圆镜智	阿閼佛	金刚部
东	白	痴	法界体性智	毗卢遮那佛	佛部
南	黄	慢	平等性智	宝生佛	宝部
西	红	贪	妙观察智	阿弥陀佛	莲花部
北	绿(黑)	疑	成所作智	不空成就佛	羯磨部

五佛的颜色与“五毒”相应,白色将“痴毒”嬗变为法界体性智,蓝色将“嗔毒”嬗变为“大圆镜智”,黄色将“慢毒”嬗变为“平等性智”,红色将“贪毒”嬗变为“妙观察智”,而绿色将“疑毒”嬗变为“成所作智”。

藏传佛教密宗具有系统的理论体系和严格的修行仪轨和次第。在修法时,要建坛城,配置诸佛菩萨神像。坛城,梵文为 mandala,又音译为曼陀罗或曼荼罗。manda 的意思是“本质”,也即佛陀正觉的本质,la 意为“聚集”,也即取得,因此曼陀罗就是取得此本质者。^②曼陀罗的宗教含义非常复杂,它是佛教宇宙观的体现,象征着宇宙结构,也是诸佛菩萨及眷属众神聚集处的模型。比如五方佛坛城,就是五方佛的空间表现。在五方佛的坛城中,主供的佛居于坛城中央,其余四佛居于周围的四方。因为各佛都有固定的颜色,五方佛的坛城就显现出五色:一色居中,其余四色环绕四方。居中的佛成为主供佛,而四周的四佛则成为主供佛的藩属。

我们再回到讨论的主题上来。蒙古人的“五色四藩”说法显然是源于五方佛的坛城。在西藏文化的启迪下,蒙古文人先有以本民族为中心的“一个中心四边八族格局”的世界想象,并在佛教密宗坛城(曼陀罗)文化影响下,又为中心和四面加上了五方佛的五色。“五色四藩”的“四藩”,并非指五色以外的其他民族,而是表达相对中心的四周,也就是青色蒙古和周边的其他四色所代表的众多民族!正因为如此,《大黄史》的作者说:“所谓四夷者,此五(色)之一为其他四色之夷也。”^③其实应该说,此五色之四为其另一色之藩属也。

① 参见杨清凡:《五方佛及其图像考察》,《西藏研究》2007年第2期。

② 参见[日]梅尾祥云著、吴信如主编:《曼荼罗之研究》(上),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③ Sampildondovyn Chuluun, Shaddarsurengiin Tserendoo sudalsan, *Erten-ü mongyol-un qad-un ündüsün-ü yeke sir-a tuyuji*, p. 134, Text: 32a.

这里必须指出,历史上的蒙古史家和当代蒙古学界一直以来对 *dörben qari* 的理解不准确,因而对其汉译亦不恰当。*Qari* 一词,在《元朝秘史》中译写为“合里”,其旁译有两次作“邦”,两次作“外邦”,还有两次作“部落”。^① 在元末蒙古文碑中,*qari* 指藩国和藩王领地。比如国舅弘吉剌部鲁王的领地就被称作 *lau qari* (鲁藩),^② 而伊利汗国等元朝藩属国家也被称为 *qari* (藩,复数形式为 *qaris*)。蒙古文献中,成吉思汗四个弟弟和四个儿子的兀鲁思也被称为 *dörben qari* (四邦)。可见,*qari* 不是外夷,而是外藩。在五佛坛城中,五佛五色,居于中心的是主供佛,而外围的四佛是“藩属”,可知 *tabun öngge dörben qari* 这样的表述来自坛城中的五佛关系,*dörben qari* 应该译为“四藩”,而不是“四夷”。

五、青色蒙古的由来

接下来,谈谈“五色”与各民族的关系,尤其是青色与蒙古的关系。

在“五色四藩”中,蒙古被称作“青色蒙古”,在五色中居中,被奉为中心,蒙古文献津津乐道“*Küdelkü-yin degedü köke mongγol*”,即“众生之尊青色蒙古”。

众所周知,蒙古本来尚白,历史以来白色才是她的代表颜色。比如:成吉思汗建国时,树九旂白纛;元朝时贺正拜天,君臣皆衣白裘;正月称“白月”,善、福、顺、吉皆言“白”,衣食住行无不以白为上。但是,有朝一日,尚白的蒙古突然呼作青色蒙古,虽然一切吉祥仍以白色表示。现在对此现象的普遍解释为,蒙古人历史上信仰萨满教,而萨满教的最高神为长生天,天蓝色,故有其俗。这完全是附会之词。蒙元时期的蒙古人信仰长生天,但那时的蒙古绝无尚青之俗,更无青色蒙古之说。

青色蒙古之说,与“五色四藩”之说同时出现。蒙古变成青色蒙古,仍与五方佛有关。

如前所述,“藏密”以佛教密宗金刚乘为主流,而金刚乘四部中,无上瑜伽部的密续在西藏更加盛行,它是从印度东北部和尼泊尔直接传入西藏的。因此,从西藏传入蒙古的佛教同样以无上瑜伽部为主流。该部以不动佛——东方的寂静尊——为中心。在坛城中,不动佛被移至中央,而毗卢遮那则移至东部。据前人研究,这样的坛城在论典中常有描述,却并不常以图画的形式出现,人们见到的坛城中,画在中央的并非不动佛,而是喜金刚、胜乐金刚、密集金刚和时轮金刚以及其他威猛的本尊,他们都被视为不动佛的化现,^③ 因此也都是青色。于是,这些坛城的中心就成为青色。这是蒙古人五色观念中青色居中的直接原因。

蒙古成为青色的另一个直接原因,则与俺答汗时期藏传佛教对成吉思汗的神格化有关。当时,藏传佛教上层给成吉思汗和忽必烈薛禅皇帝赋予了新的宗教角色,即认为成吉思汗是金刚手菩萨化身,而薛禅皇帝则是文殊菩萨的化身。^④ 因为西藏达赖喇嘛被认为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所以他们成为了藏传佛教三怙主的化身了。其中,金刚手菩萨是金刚部的部主,他的图像为蓝色身,在坛城中也是以蓝色表现的。

蒙古语的“*Küdelkü-yin degedü köke mongγol*”,其词面意思为“行动者之至尊青色蒙古”,

① 参见《元朝秘史》,四部丛刊三编本,§3, §7, §8, §9, §11。

② 参见1338年立竹温台碑文,道布整理、转写、注释:《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第273页影印件第1行。

③ 参见 David L. Snellgrove, *Indo-Tibetan Buddhism: Indian Buddhists and Their Tibetan Successors*, 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 2002, pp. 198-213。

④ 参见 *Arban buyan-tu nom-un čaya tegüge neretü sudur-un ekin orosiba, ene šasdir kememü*, 叶2下3上。

这里的动名词 Küdelkü 的本意为“动、行动、活动”，此处指所有能够行动的生命，也就是佛教所言“六种众生”，因而指宇宙所有生灵。该说法的含义是，蒙古人为世界之主宰者，就像不动佛及其化现为坛城之主尊。

蒙古以青色居中后，按照五方佛在曼陀罗中的顺序安排各族，东白，南黄，西红，北黑（绿），相应的民族分别为白色高丽、黄色回回、红色汉儿、黑色吐蕃。这个分布与这些民族的实际地理位置无关。蒙古人本来没有以颜色区分各民族的文化，只有以黑色表示敌对民族。^①可见，蒙古以五色指代五族的做法，是源于五方佛的颜色，而非本土之俗。

我们看看美岱召的壁画就会明白，金刚部曼陀罗在当时蒙古人中多么流行。美岱召佛殿顶部和立柱的彩绘以及经堂顶部的彩绘是十六世纪末建寺时所绘画的。这里有大量的金刚部威猛本尊的曼陀罗，比如金刚手、喜金刚、胜乐金刚、密集金刚、各种蓝色身愤怒尊的曼陀罗。这些曼陀罗的中央为蓝色（青色），表示不动佛及其显现，下方为白色，表示东方的毗卢遮那佛，按顺时针方向分别为黄色（宝生佛）、红色（阿弥陀佛）、绿色（代替黑色，代表不空成就佛）。^②

此外，根据笔者的考察，在西藏各地五色经幡随处可见，形如帐篷，而其颜色从上往下依次为青白红绿黄。还有藏族人家屋顶上的小经幡，形如五色旗，也是从上往下依次为青白红绿黄。佛教盛行时，蒙古地方一定也是这样，只是如今佛教文化几近泯灭，所以每个人对这些已很生疏了，但在新疆、内蒙古的蒙古族寺庙和敖包上仍能见到西藏式的五色经幡。见到此情景，很容易联想到“Küdelkü-yin degedü köke mongγol”（“众生之尊青色蒙古”）这句话的来历。

六、“五色四藩”出现的时间及其根据

“五色四藩”概念始见于《白史》。但是关于该书的成书年代，目前仍存分歧，有元代说和十六世纪后半叶说。

蒙元时期蒙古中并无“五色四藩”之说，也没有以青白红绿（黑）黄五色表示吉祥的习俗。蒙元时期中外游记、使节报告以及《蒙古秘史》为首的蒙、汉、藏、波斯、阿拉伯等诸文献对此只字未提。我们认为，该说法只有可能在《白史》成书的前夜才形成。前文提及，其实《白史》的“一个中心四边八族格局”本身就是来自十五世纪以后的藏文典籍中。这个事实反过来可以说明，《白史》就是十六世纪后半叶藏传佛教第二次传入蒙古时期成书。对此，我们可以据《俺答汗传》（Erdeni tunumal neretü sudur orusibai）^③提出以下几方面的佐证。

1. 俺答汗皈依佛教后吉祥五色观念在蒙古非常流行。藏传佛教的再次传入蒙古，与土默特蒙古俺答汗密切相关。蒙古文《俺答汗传》成书于1607—1611年间，与藏传佛教第二次传入蒙古几乎同时，对俺答汗及其周围重要人物和事件有详实而可靠的记载。在这本传记中，可以窥见五色观念在当时蒙古流行的情形。首先，“五色”的记载充斥着该传记。比如，说成吉思汗征服“五色国”（1a）；俺答汗征明时，从身上发出了“五色之光”（11a）；说忽必烈皇帝延请八思巴

① 比如蒙古文《俺答汗传》中多次出现俺答汗出征 qar-a kitad（直译为黑色的汉人）的记载，但 qar-a 并非特指汉人，只表示敌对、厌恶。比如，还有 qar-a tangyud（黑色的唐古特）的说法，本来是指敌对的西夏党项人，后指藏族，是因为 tangyud 呼作藏人的关系。

② 参见张海斌主编：《美岱召壁画与彩绘》，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参见佛殿顶部和立柱的彩绘以及经堂顶部的彩绘。

③ 以下所引皆来自该书的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藏手抄本，在文中夹注页码。

喇嘛,在“尊贵的五色国”弘扬佛法(21b);俺答汗及其钟根夫人为首的“五色国”,在仰华寺拜见索南嘉措(即三世达赖喇嘛)(27b);在仰华寺,“五色国”献上多不可数的牛羊马驼为布施(28b);为新造释迦牟尼佛像开光时,出现了“五色彩虹”(36b);“五色国”向为俺答汗做超度佛事的喇嘛们献上了无数布施(38b);四世达赖喇嘛到西藏受戒时,“出现五色彩虹,龙声作响,大地震动”(51a),等等。

2. 五色观念来自俺答汗皈依的佛教密宗金刚乘。根据《俺答汗传》中关于俺答汗皈依佛教和他去世后火化安葬的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蒙古人的五色观念与金刚乘及其五佛的关系。该传记载,俺答汗拜见索南嘉措后请教,佛教经典极多,有无获得佛果之捷径?索南嘉措回答:获得佛果的捷径就是密教金刚乘。俺答汗又问:八思巴喇嘛授我祖先薛禅皇帝的喜金刚灌顶为何?喇嘛回答:此乃无比金刚乘灌顶。于是,俺答汗及其夫人和蒙古贵胄都接受了索南嘉措所授喜金刚灌顶,皈依了金刚乘佛教(32a—32b)。

该传还记载,俺答汗去世后,土默特蒙古将其土葬。但是,三世达赖喇嘛来土默特后,按照佛教习俗,将其遗骸重新火化后进行塔葬。《俺答汗传》中记载,进行火化时,天空变得晴朗无垢,出现五色彩虹,降下花雨,空中显现五善逝即五方佛种子字。在把骨灰取出时,出现了寂静和愤怒诸佛及观世音菩萨的种子字,还有五方佛的种子字,即大日如来的 om 字、阿閼佛的 hūm 字、宝生佛的 traṃ 字、阿弥陀佛的 hriḥ 字、不空佛的 aḥ 字,犹如五色珍珠连成的念珠,然后“五色国”把出现的五色舍利分取并供养。最后将俺答汗骨灰安置在大昭寺西厢的“青色宫殿里”,并请金刚手化身济咙呼图克图为之开光(44b—45a)。

这些记载的内容是否属实暂且不论,但它表明,当时蒙古人的五色观念毫无疑问与五方佛有关。

3. 俺答汗的都城与安放他灵塔的宫殿之颜色与五色观念有关。俺答汗以忽必烈转世自居,“仿照失陷的大都”建造都城(19a),梦想在八思巴喇嘛转世三世达赖喇嘛的帮助下,实现成为蒙古汗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的理想。但他没有将新建的都城命名为大都,而称之为呼和浩特,即青城。在金刚乘无上瑜伽部信仰的背景下,当时蒙古以青色蒙古自居,居于五色民族之中心,所以俺答汗的都城理所当然是青色都城,而不可能是其他颜色的城。俺答汗去世后,土默特蒙古建造青色的宫殿作为他身后的居所,请金刚手化身为其开光(45a),这也是令俺答汗遗骨居于青色金刚城之意。此种种种现象显示,“五色”观念和尚青习俗始于俺答汗时期。

4. 蒙古历法中的五色始于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蒙古历法,一直以来使用十二生肖历法。^①但是,据《俺答汗传》记载,十七世纪初,蒙古纪年已趋于多样化,变得相当复杂了:

《俺答汗传》中的纪年	汉地纪年(公元)	《俺答汗传》的页码
ulaγan barsjil 红虎年	丙寅(1506)	4a
γal qutuγtu em-e taolai jil 吉祥火母兔年	丁卯(1507)	4a
čaya morin jil 白马年	庚午(1510)	5a
taulai jil 兔年	己卯(1519)	5b

① 对此可参考《元朝秘史》、元代各种蒙古文碑文、《黑鞑事略》、《夷俗记》以及吐鲁番和黑城出土蒙古文文书等相关资料。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在释读黑城出土蒙古文文书时,曾将一残片上的某词复原为 ulaγan, 因为其后面的词为 moyai (蛇), 故推测为“红蛇年”。现在看来,这样推测缺乏依据,因为在整个元代都未见过蒙古人用五色纪年法的例子。参见吉田顺一、齐木德道尔吉编:《黑城出土文书研究》(日汉合璧),雄山阁,2008年,第172页,图片 No. 083。

bečin jil 猴年	甲申(1524)	5b
qar-a luu jil 黑龙年	壬辰(1532)	6a
qar-a moyai jil 黑蛇年	癸巳(1533)	6b
moyai jil 蛇年	癸巳(1533)	6b
köke morin jil 青马年	甲午(1534)	6b
köke qonin jil 青羊年	乙未(1535)	6b
ulaγan takiy-a jil 红鸡年	丁酉(1537)	7a
sir-a noqai jil 黄狗年	戊戌(1538)	7a
noqai jil 狗年	戊戌(1538)	7a
čaya uker jil 白牛年	辛丑(1541)	7b
qar-a bars jil 黑虎年	壬寅(1542)	8b
köke luu jil 青龙年	甲辰(1544)	9b
köke morin jil 青马年(误,应为青蛇年)	乙巳(1545)	9b
čaya γaqai jil 白猪年	辛亥(1551)	9b
ulaγan moyai jil 红蛇年	丁巳(1557)	11a
morin jil 马年	戊午(1558)	11a
sir-a luu jil 黄龙年	戊辰(1568)	12b
temür qutuγtu ere morin jil 吉祥铁公马年	庚午(1570)	13b
čaya qonin jil 白羊年	辛未(1571)	15b
čaya qonin jil 白羊年	辛未(1571)	16b
em-e čaya qonin jil 公白羊年	辛未(1571)	17a
usun bečin jil 水猴年	壬申(1572)	19a
köke noqai jil 青狗年	甲戌(1574)	21a
quluγan-a jil 鼠年	丙子(1576)	23a
ulaγan quluyan-a jil 红鼠年	丙子(1576)	23a
uu bars jil 戊虎年	戊寅(1578)	27a
čaya luu jil 白龙年	庚辰(1580)	35a
čaya moyai jil 白蛇年	辛巳(1581)	37a
qara morin jil 黑马年	壬午(1582)	40a
γal qutuγtu noqai jil 吉祥火狗年	丙戌(1586)	42b
köke takiy-a jil 青鸡年	乙酉(1585)	43a
γaqai jil 猪年	丁亥(1587)	44a
quluγan-a jil 鼠年	戊子(1588)	45b
sir-a noqai jil 黄狗年(误,应为黄牛年)	己丑(1589)	46a
bars jil 虎年	庚寅(1590)	46a
čaya taulai jil 白兔年	辛卯(1591)	46b
qar-a luu jil 黑龙年	壬辰(1592)	46b
qar-a moyai jil 黑蛇年	癸巳(1593)	48b

qar-a luu jil 黑龙年	壬辰(1592)	48b
čaya quluyan-a 白鼠年	庚子(1600)	48b
qar-a bars jil 黑虎年	壬寅(1602)	50b
usun taulai jil 水兔年	癸卯(1603)	51a
qar-a bars jil 黑虎年	壬寅(1602)	51b
ulayan qonin jil 红羊年	丁未(1607)	51b

综合以上纪年记载,当时蒙古历法的纪年大概有四种情况:一是传统的十二生肖纪年,如兔年、猴年等;二是五行分阴阳,并与十二生肖搭配,但阴阳经常省略,如铁公马年、水兔年等;三是天干与十二生肖搭配,如戊虎年;四是五色分阴阳,并与十二生肖搭配,但阴阳常省略,如母白羊年,白羊年等。其中,第四种用得特别频繁,这在当时是一种新纪年。这个新纪年是对藏历纪年的五行分阴阳并与十二生肖搭的做法进行改革的结果,即把五行改为五个颜色,等于用五色记中原历法的十个天干,一色代表两个天干,比如黑龙年(壬辰,1592年)、黑蛇年(癸巳,1593年),青马年(甲午,1534)、青羊年(乙未,1635)等。后来,表示五色的蒙古语词才逐渐分离为分阴阳二性的词,以表示颜色的形容词原形代表阳性,该形容词加后缀-γčīn (-gčīn)表示阴性,于是出现了诸如 kōke 和 kōkegčīn 表述,记载十个天干。此处的 kōke,意为青色,表示阳性,记天干的“甲”,kōkegčīn,是 kōke 中派生出来的,记天干的“乙”,表示阴性。因此,这两个词相当于甲乙,而不是有些人理解的那样表示“青色”和“浅青色”。

以五色记天干的做法始于十七世纪初,^①再早也早不过十六世纪末,这说明,蒙古纪年也受到了五色影响,可见在当时蒙古五色多么流行,影响多么大。

以上种种说明,“五色四藩”概念出现在十六世纪后半叶,它的出现与藏传佛教第二次传入蒙古有关。五色来源于五方佛的颜色,四藩则指主供佛周围的四佛。青色蒙古的说法起源于蒙古对密宗金刚乘无上瑜伽部的信仰。“五色四藩”说的形成年代再次证明,《白史》并非成书于忽必烈时期,而是十六世纪后半叶。

到了十八世纪以后,受藏传佛教文化影响而产生的“五色四藩”概念反向藏族文化回流,而到了清末民初,蒙古的“五色”象征对“五族共和”产生了影响。因为篇幅关系,这些问题我们将另撰文论述。

〔责任编辑 贾 益〕

^① 有学者指出,在契丹有过五色纪年法。因为契丹文还没有最后被释读,所以这个说法是否成立,尚无定论。即便契丹人已有五色纪年法,但该文化没有传入蒙古,有关蒙元时期的蒙古纪年法的相关资料可资证明。

Prof. Ma attempted to achieve the localization of ethnology through the native field work and the studies of ethnic history and culture, which reflects his fully inclusive and equitable academic purport.

Keywords: Prof. Ma Changshou; ethnological studies; knowledge structure; academic purport; localization.

Cuoka 措卡 Governance System of Aka people, A Subgroup of Hani Ethnic

Group: A Case Study on Mangjiu New Village of Menglian Town in

Pu'er City Zhang Xiaojun and Li Qian(66)

Abstract: In Mangjiu new village of Menglian town in Pu'er city, Yunnan province, the ancient Cuoka governance system of Aka people, a subgroup of Hani ethnic group, is still well preserved. The system consists of three layers of authority: The first layer is the symbolic authority represented by Zun 尊 or Zunma 尊妈; the second layer, incarnated in wizards and blacksmiths, is the sacred cultural authority displayed in both spiritual and material forms; the third layer is the physical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constituted by village elders, chiefs elected through democratic processes, and members of Cuoka. It adopts the governmental system of democracy, equal rights, and division of labor. The system of Cuoka achieves the goal of governance by traditional governance culture. The Cuoka system has provided a vivid example of human governance for the political anthropology.

Keywords: Cuoka governance system; Hani ethnic group; Aka people; traditional governance culture; political anthropology.

On Some Versions on "State" and Related Concepts in the Mongolian Historical

Documents Borjigidai Ulaan(75)

Abstract: There were some versions on "state" and related concepts of the ancient Mongols recorded in the Mongolian historical documents. Among them, "state" was mainly expressed by ulus, which originally meant "people" or "common people". The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of scope of Mongolian own regime and neighboring countries mainly meant "the area from the sunrising to the sunsetting" during the Mongol-Yuan period, and "Five colors and four vassals" from the mid-16th century to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appellations of "China" by the ancient Mongols had some distinctions in different times, that is to say, the names Qitad ~ Kitad, Nanggiyad ~ Nanggiyas, Jauqud ~ Jaqud, and Dumdadu ulus were used respectively. There were some changes on those related statements including Mongolian traditional factors and foreign cultural f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usage of them.

Keywords: Mongolian historical documents; concept of "state"; areas from the sunrising to the sunsetting; "Five colors and four vassals"; China.

The Origins and the Meanings of "Five Colors and Four Vassals" in

Mongolian Historiography Borjigidai Oyunbilig and Kong Lingwei(85)

Abstract: The paper examines the notion of "five colors and four vassals" (tabun öngge dörben qari) in Mongolian cultural history by utilizing Mongolian and Tibetan sources. The notion "five colors and four vassals" appeared in the late sixteenth century, which was related to the second propagation of Tibetan Buddhism in Mongolia. "Five colors"

derived from the colors of the Five Dhyani Buddhas; "four vassals" originated in the other four Buddhas that surrounded the Yidam in the center. And "blue Mongol" arose from the Mongolian belief in Anuttarayoga Tantra of Vajrayana. In sum, the notion of "five colors and four vassals" spreading in Mongolia reflected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and integrations between Mongolia and Tibet.

Keywords: "Five colors and four vassals"; Mandala; Blue Mongol (köke mongyol); Mongolian historical documents; Ethnic cultural integrations.

The Politic Practice Named "Great Unification" as well as Multi-Ethnic

Integration and Identity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Peng Fengwen(98)

Abstract: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ideology of "Dayitong" 大一统 ("Great Unification") was spread widely. And its political practice also came into being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tribes and states around the Western Han. It created good atmosphere for the multi-ethnic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promoted multi-ethnic integration and identity, and provide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multi-ethnic unified country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hesion.

Keywords: Western Han; "Great Unification"; ethnic integration; identity.

The Title of Yelülihu 耶律李胡 and Heluwo 和鲁斡 in the Liao Dynasty

..... Zhang Shaoshan(106)

Abstract: *Liaoshi* 辽史 (*History of Liao Dynasty*) was written after the demise of Liao Dynasty. There were a lot of mistakes in this book. Yelülihu, young brother of Liaotaizong 辽太宗, was given different titles, namely, Huangtaidi 皇太弟 and Huangtaizi 皇太子. And the title of Heluwo was also mistaken for Huangtaishu 皇太叔. The related funeral eulogy and epigraph written by Chinese or Kitan scripts proved that the title of Heluwo actually was Huangtaishuzu 皇太叔祖. Based on some unearthed stone inscriptions and the usage of scientific methods of comparison, contrast and classification, the paper argues that titles of Yelülihu and Heluwo in fact respectively were Huangtaidi and Huangtaishuzu.

Keywords: Yelülihu; Heluwo; title; *Liaoshi*.

African Studies in Anthropology: History, Status and Reflections ... Xu Wei(111)

Abstract: The theories and paradigms in anthropology have been rethought and reconstructed for over a hundred years, in which African studies constructed by western anthropologists and African native anthropologist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Anthropologists built the related theoretical paradigms and collected abundant materials based on the long process of colonization, in contrast, African native anthropologists emphasized the African realist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critics of western researches. Nowadays, based on those related studies abroad, Chinese anthropologists begin to expand African studies.

Keywords: African studies in Anthropology; western anthropology; African native anthropology.

The Summary of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ssociation of Chinese

Anthropology in 2015 Wang Ping(121)